



城镇化是今年两会热词。作为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城镇化道路该怎么走?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连日来,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走高质量城镇化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王 晋

“城镇化对中国来说是个长远的课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委员表示,推进城镇化一定要以人为本,不能以GDP为导向。一要加强农业现代化,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保证农产品安全供给,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保障;二要切实节约土地资源,维护被征地农民的权益;三要系统解决农民进城后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制度性问题;四要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还要加强新农村建设。“总体来说,新型城镇化建设应科学发展、全面协调、科学集约用地、公平公正对待农民,这样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陈锡文委员说。

“城镇化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致公党北京市委副主委谢朝华委员说,一些地方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盖起一片片新楼房,但由于对产业规划不足,没有产业支撑,成了“空城”。同时,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只重视地面上的房子,对地下污水、环境污染没有很好

地解决,缺乏对环境的整体规划,对一些历史村镇的保护力度不够。

谢朝华委员认为,推进城镇化要创新思维,不能走老路。首先要制定规划,抬高门槛,城镇化要有具体指标,除了面积、人口等指标,还要有就业、基础设施等指标;其次要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都要先行规划;第三要有产业拉动,根据不同条件因地制宜,靠大企业、大市场、大型科研机构来带动,保障就业。只有这样,城镇化才不会“变味”。

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孔庆平委员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应避免盲目扩张,要分类发展,着力提升城市服务质量,提高资源利用率,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中西部差距。对于大中城市来说,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供配套服务,营造宜居环境;而小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城镇,要根据地方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另外,要明确政府、企业和农民的责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通过政策引导、产业对接、农户参与等模式,发展农业现代化,确保农民收入持续提高。

小城镇建设呼唤金融支持

本报记者 来 洁

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希望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加大对重点小城镇的支持力度

言语质朴、皮肤黧黑的甘连舫委员搞小城镇改造已经十几年了,“我们建设的小城镇,人口已经从最初的几千人增加到几万人,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都感到很满意。”

“我们搞小城镇建设的重要经验是,在农民、农民工转化成市民的过程中,必须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星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甘连舫是老委员了,他今年的提案是文体产业促进小城镇发展。

甘连舫委员说,搞好小城镇建设,必须按总规详规执行,必须确保农民利益,包括他们的就业、培训等,必须保证提供市民化

的生活环境,水暖电气都要通,还要满足文化体育娱乐的需求。

对未来小城镇的建设,甘连舫委员盼着金融支持的力度更大一些。“希望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加大对重点小城镇的支持力度,毕竟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甘连舫委员说,小城镇的建设可以是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全方位参与,国有、民营、外资的都可以进入。另外,当前小城镇建设中最难的就是行政审批特别慢,希望审批权限能多下放一些,镇里的事在区里就能批准,不用往市里跑。

莫让新生代农民工“边缘化”

本报记者 牛 瑾

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公平福利待遇,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医疗、养老和就业等公共服务

新型城镇化是今年两会期间的热词,相关议案提案也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表示,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的最大引擎,是继人口数量红利之后的发展新红利。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群体,他们约占农民工总数60%以上,没有返乡的愿望,没有务农的技能,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却又不被真正接纳。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距离没有拉近,与乡土的距离却着实远了,他们正在遭遇“城乡双重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全国政协委员穆可发建议,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不

公平福利制度,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均等的医疗、养老和就业等公共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工商联副主席苏如春建议,可以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推行“9+1”义务教育,即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根据就业意愿选择专业,免费到指定的正规职业技术学校参加半年到一年的职业教育,并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同时,积极探索农民工养老保险可持续、可转移的办法,逐步建立城乡接轨、全国衔接的社保体系,让农民工真正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进一步加大保障房供给力度,通过修建农民工租赁房和廉租房等办法,多渠道提供和改善农民工的住房条件,解决好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如何推进城镇化,不仅是人大代表关心热议的话题,各地的实践探索也在积极进行中。

上图 在会议现场,人大河南代表团刘卫星代表(左一)和刘国庆代表就积极探索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话题交流想法。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右图 在山东即墨,农民在太阳能光伏大棚里管理立体栽培的蔬菜。即墨市积极探索将光伏、现代农业和新型城镇社区有机结合,打造新型城镇化“太阳能小镇”。宁友鹏摄(新华社发)



工业园区催生现代化小镇

本报记者 陈 静

产业集聚能打破城镇化建设中遇到的就业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缺乏、服务体系不完善等诸多瓶颈

新型工业化如何与城镇化形成良性互动?作为来自装备制造产业的一线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詹纯新谈起了他的亲身经历。

“一个工业园区,带来了一座现代化的小镇。”詹纯新代表说,几年前,中联重科将一个建筑起重机械制造园区建在湖南省常德市澧溪镇,到2012年,该园区实现产值120亿元,带动了153家配套企业。中联重科落户后,澧溪镇人口增加至3.5万人,90%的劳动力实现了当地就业,其中近万名为产业工人。

“产业集聚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詹纯新代表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际上是鼓励产业向城镇集聚。

詹纯新代表认为,产业集聚能打破城镇化建设中遇到的就业不足、可持续发展能力缺乏、服务体系不完善等诸多瓶颈。一方面,成熟产业落户城镇,附近农民接受培训后成为产业工人,素质提升,观念转变,收入稳定,可真

正实现安居乐业。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得到改善,使城镇化建设从“输血”变“造血”,从而可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另外,消费能力稳定的居民更多聚集和城镇基础设施逐步改善,又为第三产业的繁荣营造了良好环境,能促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通过工业化而实现的城镇化,还能促进农业现代化。”詹纯新代表介绍说,如今澧溪镇周边已形成柑橘、稻米、花木等一系列现代农业合作社,它们形成的基础正是当地有大量农民转为产业工人,从而使耕地得以流转,实现了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投身新型城镇化建设,对企业来说也有好处,不仅用地成本低,而且用工实现本地化,就地招工、就地培训,降低了人力成本,减少了人员的流动性,提高了员工稳定性。”詹纯新代表说,推进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是新时期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希望有更多制造业企业走出大城市、走进更为广阔的城镇,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将更为精彩。

议政录

着力提高农民工素质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宣教部部长李守镇:农民工的思想文化、行为素质和生产技能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提升农民工整体素质已成当务之急。

一是提高农民工思想道德素质,建议将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免费向农民工开放,并进一步落实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农民工广泛参与企业和社会管理。二是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素质,采取财政补贴等优惠措施,鼓励企业广泛开展农民工岗前培训和在岗技能培训,同时积极开展订单培训、定岗培训。三是提高农民工科学文化素质,引导农民工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同时开展心理健康咨询、情感关怀和心理疏导工作,帮助他们培养健康向上的情趣,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生活。

(本报记者 李佳霖整理)

优先采用自主创新装备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昭信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凤仪: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许多国产装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完全可替代进口产品。但很多国内企业仍不敢轻易使用国产重大装备制造设备,因为国外的设备相对成熟,用起来省事。

为此,建议对率先采购国产重大装备的企业给予大力扶持,加快装备国产化步伐。建议对率先购买国产设备的企业,给予支持科技发展及自主创新补贴,并在使用过程中给予更多的扶持。比如,广东昭信企业集团花巨资完成了国内首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MOCVD重大装备的产业化,价格为进口产品的一半,如果有更好的政策支持,将会加快国产化速度,进一步提升我国自主创新水平。

(本报记者 张建军整理)

走出“绿色生金”之路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丽水市委书记王永康:实现经济跨越发展、民生显著改善,应走出一条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绿色生金”之路。丽水紧水滩电站建成发电后,周边乡镇一度依托工程遗留下的闲置用房发展工业。几年前,紧水滩镇把工业企业迁出去,专心发展生态旅游,库区周边办起几十家渔家乐,渔民生活富裕起来,环境也得到保护。

丽水市遂昌县高坪乡的3个村联合将“好山好水好空气”打包整合,举办“生态拍卖会”,3个村一年的休闲养生服务权拍出174万元,乡村休闲游的“遂昌模式”已被评为全国山区旅游发展的典范。

优越的生态环境,已吸引微软、娃哈哈、伊利等企业纷纷落户。“好生态”的确可以吸引“好产业”,带来“好生活”。

(本报记者 吴佳佳整理)

贫困地区自身造血更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罗凉清:凉山州近年来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但17个县市中有11个是贫困县,是凉山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凉山州的扶贫攻坚要“两条腿”走路,一是借力国家加大扶贫力度的好政策,二是注重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

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推动攀西地区加快战略资源创新开发,加快建设安宁河谷经济带和金沙江下游沿江经济带,推动攀西城市群建设,这对凉山州来说是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做好资源开发这篇大文章,打造千亿水电、千亿矿冶产业集群和百亿产业园区,建成全国最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

(本报记者 刘畅整理)

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大理州州长何华: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云南,应该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自国家实施长江中上游天然林禁伐以来,西藏、云南等地的生态保护成效显著。目前,云南省森林覆盖率已上升到国土面积的52%。但由于多种原因,云南等地许多地方生态环境仍较脆弱,产业结构单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当地的重要生态功能区、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因强化生态保护而被限制或禁止开发。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应考虑生态补偿因素,国家和地方可分别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当前,应采取有效行动,尽快落实相关精神。可由中央制定碳排放标准,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超标的地方向节约的地方买指标,使发展工业的地方与生态保护的地方都有保障。

(杨清心 周斌整理)

资源约束瓶颈如何破解

本报记者 鲍晓倩

“随着刚性需求的不断上涨,我国的铜资源已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欠账越来越多。”全国人大代表、江西铜业股份公司党委书记李保民说,2000年,中国铜产量130万吨,消费量190万吨。到了2012年,铜产量580万吨,消费量则高达780万吨。

面临同样处境的还有钢铁产业,一面是产能严重过剩,一面是国产铁矿石难以满足生产需求,大量进口铁矿石的尴尬局面。

但同时,我国的资源利用存在大量浪费现象,不仅是在矿产资源的开采冶炼环节,也存在于使用环节。

“拿特殊钢种弹簧扁钢来说,若用中高端产品代替低端产品,可以节约30%至50%的用量。”全国人大代表、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崇武认为,应采取多种手段,切实避免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益。

钟崇武代表建议,完善行业标准,促进产品升级换代,“这也是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同时还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工业领域的类似浪费非常惊人,导致产能过剩并且造成多重污染。”

李保民代表认为,应鼓励矿山资源的充分利用,比如低品位矿,只要能用的,就应该想办法“吃干榨尽”。“铜是伴生矿,我国铜的资源利用率平均只达到50%,而在发达国家已经达到80%,如果我们能提高资源的回收利用百分点,就能提高综合利用率。我们德兴铜矿对部分铜品位在0.25%至0.2%或更低的含铜废石进行充分回收利用,实现了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矿产资源的合理开采和利用,还需要严把管理关,“矿山整顿是个敏感话题,我国的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现象,有的地方甚至探矿权和采矿权不分,边

探就边采。”李保民代表说。

矿产资源利用不仅需要“吃干榨尽”,还需“变废为宝”,这一理念更需要从开采环节一直延续到冶炼、加工生产环节。李保民代表介绍说,德兴铜矿百泰硫化铜厂利用生物硫化法回收酸性水中的铜矿资源;铜矿厂除了主产金属铜外,还伴生有金银等多种成分,江铜集团贵溪冶炼厂通过不断自主创新,实现了铜冶炼综合回收率98.15%以上,金、银综合回收率分别达94.51%、94.52%以上。

“企业要认识到,节能减排本身就是有效益的。”钟崇武代表说,方大特钢通过技改,先后淘汰了一批能耗高、指标差、污染大的装备,新设备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近几年,方大特钢创造的利税甚至超过同行业一些千万吨级企业,而所用的资源不到千万吨级企业的三分之一。

会外热点会内谈



伴随经济

的快速发展,我

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

的矿产和金属的消费国之一,但面临的资源约束也正

日益强化。经济持续发展

该如何破解资源约束瓶颈?